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

"Indigenization" (bentuhu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d State Power

doi:10.6752/JCS.200509_(1).0004

文化研究, (1), 200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2005

作者/Author：蕭阿勤(A-Chin Hsiau)

頁數/Page：97-12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5/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509_\(1\).0004](http://dx.doi.org/10.6752/JCS.200509_(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 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

蕭阿勤**

“Indigenization” (*bentuhu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d State Power
A-chin Hsiau

投稿日期：2004年4月9日。接受刊登日期：2005年3月8日。

* 本文的英文初稿 (Is “Strategic Essentialism” just Strategic? : Narrative, Nationalist Cultural Politics, and “Indigenization” (*bentuhu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曾發表於Workshop on Nativist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delaide University, Australia, February 9-12, 2003)。英文修訂稿，以“The Indigeniz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d State Violence”為題，收入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eds., 2005,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中文的修訂稿，則曾發表於「日本台灣學會第五回學術大會」(大阪，關西大學，2003年6月14日)與「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家圖書館，2003年12月21日)，並曾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演講(2004年1月12日)。作者感謝若林正文、黃英哲兩位先生的評論、以及與會諸君的批評建議。本文基於上述初稿與修訂稿，又有不少增補改動。筆者謹此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的批評建議。

** 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通訊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電子信箱：ahsiau@gate.sinica.edu.tw



1980年代以來，「本土化」做為關於台灣的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之參考架構，在台灣的文學（與歷史）領域引起激烈爭論。本文的目的在解釋本土化典範為何在文學領域引起遠較其它領域嚴重的爭論衝突、為何文學領域中的這個議題與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它領域更為密切。關於這些現象的歷史發展過程，一些既有的研究已有探討。因此本文另闢蹊徑，從理論分析的角度提出三點解釋：第一，由於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是一種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其相關的爭論有如世界觀的衝突；第二、由於認同政治 / 文化鬥爭中的「策略的本質主義」與本質主義之間不易區分，即使是策略性的認同宣稱，也容易引起本質主義色彩的對抗；第三，因為文學的本土化典範終究涉及國家權力。本文對這三方面解釋的分析討論，都圍繞在文學本土化典範的基本性質，亦即它是一種敘事化、相對封閉的意義形構整體。

關鍵詞：台灣文學，本土化，敘事認同，策略的本質主義，民族主義



一、前言

從1980年代以來，「本土化」做為關於台灣的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之參考架構，在台灣的文學與歷史領域中，成為經常引起激烈爭論的重大議題。這些爭議中涉及的「本土化」，是一種典範性原則；它要求的是重視台灣歷史、文化、社會的特殊經驗，並從台灣本身的觀點詮釋這些經驗。如同眾所周知的，這種爭論現象的一個明顯原因，是文學與歷史這兩個知識或文化領域，與台灣政治變遷有極密切的關係。這些知識文化立場的激烈衝突，是近二十年台灣族群與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一部分。如果從「回歸鄉土」或「回歸現實」的文化潮流出現的1970年代算起，我們在其它知識與文化生產領域，也可以看到本土化典範成為知識建構或文化再現的重要議題。然而在這些其它領域中引起的爭論，卻遠不如在文學與歷史中那麼激烈而持續久遠。在這些其它的領域中，這個議題與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也不如在這兩個領域的密不可分。

本文的目的，即在解釋本土化典範為何在文學領域引起遠較其它領域嚴重而持續的爭論衝突，以及為何文學領域中的這個議題與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它領域更為密切。解釋這個問題，大致可以從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可以從「歷史過程」來理解，另一方面則可以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探討。在歷史過程方面，70年代的回歸鄉土理念，可以說是本土化典範的最早版本，而文學在當時就是最致力於實踐這個觀念的文化活動領域。回歸鄉土同時也包括重新挖掘台灣歷史，尤其是關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與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探究。80年代之後，文學與歷史則一直是台灣民族主義建構台灣民族認同的兩個主要文化領域，而文學家與歷史研究者也是推動台灣民族主義的最主要的文化知識份子。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學家與歷史研究者，始終強調本土化典範應該成為建構關於台灣的知識、再現台灣文化的重要參考架構——如果不是唯一參考架構的話。本土化典範因此主要就在文學與歷史領域，成為支持者與反對者爭議的焦點。關於這種歷史過程，一些探討台灣文學本土論或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的既有研究已有詳細分析（譬如：游勝冠 1996；蕭阿勤 1999；Hsiau 2000），因此本文不再從這個取向來討論。

本文企圖從理論分析的角度解釋為何本土化典範在文學領域激起強烈而長久的爭議。雖然理論分析上的探討，無法脫離歷史過程的理解，但從前者角度的討論，重點

與後者有所不同。下面的分析將指出，在文學領域成爲長久爭議焦點的那種本土化典範，通常涉及一種歷史敘事，亦即從特定的主體觀點出發，以清楚的開頭、中間、結尾的次序來安排事件的一種「情節化」的論述形式。在這種歷史敘事中，敘事者的主體位置（亦即其認同）、對利益的認知、對行動方向的選擇等，與其對文學和歷史經驗的意義詮釋密不可分；而其中涵蓋的文學與歷史經驗由於情節化的作用，構成一個意義的整體。在文學（與歷史）領域中本土化典範引起的爭議，通常就涉及不同歷史敘事的衝突。這些歷史敘事構成認知典範，或是一種對現實的包裹式觀點，因而難以找到妥協的平衡點。再者，本文指出，80年代以來，做爲反抗「再殖民」鬥爭之一部分的台灣文學本土化典範，其中從「去中國化」到「（台灣）民族化」的歷史敘事所建構的台灣認同，具有後殖民主治／文化鬥爭的「策略的本質主義」特徵。然而筆者認爲，策略的本質主義幾乎不可能只是策略的，它與本質主義之間難以區分，往往引起本質主義式的認同衝突。這是爲什麼本土化典範在文學領域引起激辯，而與集體認同政治關係密切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將進一步指出，不管台灣文學本土化典範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相信文學的問題只有在政治上依賴國家權力才能得到解決。換句話說，文學本土化典範以及與其對抗的典範，各自以不同的國族敘事所創造的意義，只有靠終極憑藉爲暴力的現代國家，才得以確保。綜合而言，對於本土化典範爲何在文學領域引起遠較其它領域嚴重的爭論衝突，而且爲何與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它領域更爲密切，本文在理論分析上的解釋有三點：第一，由於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是一種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其相關的爭論有如世界觀的衝突；第二、由於認同政治／文化鬥爭中的策略的本質主義與本質主義之間不易區分，即使是策略性的認同宣稱，也容易引起本質主義色彩的認同對抗；第三，因爲文學的本土化典範終究涉及國家權力。本文對這三方面解釋的分析討論，都圍繞在文學本土化典範的基本性質，亦即它是一種敘事化、相對封閉的意義形構整體。

二、本土化典範的兩種類型與敘事認同

70年代是關於台灣本身的知識建構與文化表現的本土化典範開始發展的「軸心時期」(the Axial Period)。¹由於台灣的國際處境艱難、國民黨政府程度有限的政治革新、社會經濟的變遷、戰後世代的步入社會、學術界與文化工作者的自我反省與求新

求變等因素的輻湊匯集，使許多知識與文化生產領域都出現追求本土化的動力與實踐，尤其是關於台灣本身的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的本土化。這個時期的本土化典範，在不同的知識與文化生產領域的發展方式並不一樣。不過即使如此，它們對往後至今台灣社會的影響，都相當深遠。

爲了本文分析的目的，我將70年代以來至今台灣的本土化典範，依照建立「理想型」(ideal type)的方式，區分爲「敘事的(narrative)本土化典範」與「非敘事的(non-narrative)本土化典範」兩類。就後者而言，譬如在美術的領域，70年代的回歸鄉土文化潮流，使洪通的繪畫與朱銘的雕刻備受肯定。當時美術界新興的論述基調在於批判崇洋、謳歌民間藝術，提倡西化與工業化程度最少的鄉村與民俗來做爲美術創作的題材。但是美術界在後來並未發展出較有系統的本土化理念（林惺嶽 1987:201-228）。又譬如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少數學者，則在70年代下半葉開始反省這些領域對西方學術發展的過份依賴（楊國樞 1993:8,63-64）。這些領域在1980年之後以「社會及行爲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爲名所推動的具體工作，主要在針對台灣的社會文化，追求契合本地經驗的概念、理論、與方法，以便更恰當地分析理解自己社會文化的經驗。²上述美術、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領域中出現的本土化典範，由於其主張並非明顯地依賴一個關於台灣的歷史敘事，因此筆者稱之爲「非敘事的本土化典範」。我們也許可以說，上述這些領域中對本土化知識與文化再現的追求，仍然不免涉及某種特定的歷史認識。不過，如同本文下面指出的，歷史敘事對文學（包括歷史）領域的本土化典範有支配性的作用，構成其本土化理念的核心。相較之下，類似美術、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中，其隱含的歷史敘事與其本土化典範的關係，則是相對地微弱而間接的，並且其中也幾乎未涉及文學本土化典範的歷史敘事所

¹ 這裡「軸心時期」的概念借自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 Jaspers, 1883-1969)。雅斯培以「軸心時期」來形容人類歷史從西元前800至200年——尤其是西元前500年左右——的這段時期。當時在中國、印度、與西方，人們開始反思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而在三個地區幾乎同時發展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雅斯培認爲，「這個時代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其範圍內思考的基本範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生活的世界宗教的開端。……這個過程的結果是：到那時爲止被無意識地接受的觀念、習慣、與環境，都受到審察、質疑、與清理。一切都被捲入漩渦。就那些仍然具有生命力與現實性的傳統內容來說，其表現形式被澄清，因而也就發生了變化。」(Jaspers 1953[1949]:1-2)筆者認爲，就70年代的政治／文化變遷及對其往後的社會影響而言，它在戰後的台灣歷史上，猶如雅斯培所認爲那段西元前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樣。因此筆者以「軸心時期」來形容70年代的重要性。

² 參考楊國樞、文崇一(1982)、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1985)、蔡勇美、蕭新煌(1986)、傅大爲(1991)、文崇一(1991)、楊國樞(1993)。在80年代結束前後，社會學與人類學的「中國化」呼籲與行動就已逐漸銷聲匿跡。至於心理學在這方面，則至今仍蓬勃發展。不過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概念，在1987年左右則轉爲「本土化」（楊國樞 1993:9, 64-65）。

產生的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等問題。它們即使曾經引起爭論，所涉及的政治、文化層次，不像文學領域的論辯一樣，直接牽涉到國家機器的爭奪。其爭論，也遠不及文學領域所引發者的持續深遠。

至於「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則在70年代以來的文學與歷史領域中出現，並且對這兩個領域的影響最為顯著。其具體主張與實踐方式，與那些提出「非敘事的本土化典範」的知識與文化生產領域所追求的，並不相同。爲了理解這種敘事的本土化典範，我們必須先討論敘事的概念。敘事即使有種種不同的定義，但歸納來說，這些定義共通地指出，敘事是「以具有清楚開頭、中間、結尾的次序來安排事件的一種論述的形式」，而這正是大多數研究者所認爲的敘事——或故事——的基本特質(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xv)。³對於事件做開頭、中間、結尾的序列安排，使之具有「情節」(plot)，是敘事最重要的特徵；亦即「情節賦予」(emplotment)，是使事件的陳述具有敘事性(narrativity)的最重要關鍵。情節的賦予把事件轉變成連續故事中的一幕(episode)，使獨立的個案具有意義，也因而將敘事的各部分聯繫起來，成爲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如同Somers與Gibson指出的，敘事性並不是把事件放在一個孤立的範疇中來尋求其意義，它不會把事件當做單一的現象來理解。敘事性最突出的特徵就在於：只有在與其它事件的時間與空間關係中，才能辨識任何事件的意義(Somers and Gibson 1994:59)。爲了尋求秩序與意義，在安排清楚的事件開頭、中間、結尾的情節賦予過程中，敘事並非簡單地反映現實，而是包含了選擇、重組、簡化現實等機制(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xvi)。

許多研究者都認識到敘事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重要性及其普遍存在的事實。就像Roland Barthes經常爲敘事研究者所徵引的一篇早期文章所指出的，「敘事出現在每個時代、每個地方、每個社會；它正是與人類的歷史一起出現，我們找不到沒有敘事的人們，也從來沒有。……敘事是超越國界的、超越歷史的、跨文化的：它就在那裡，就像生命本身。」(Barthes 1977[1966]:79) Paul Ricoeur在他被譽爲二十世紀中「文學理論與歷史理論最重要的集大成之作」⁴的*Time and Narrative*第一卷中所集中討論的，正是人類敘事活動與其經驗的時間特性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Ricoeur言簡意賅地

³ 在以下的討論中，就像心理學家Jerome Bruner(1986, 1990, 2002)、Theodore R. Sarbin(1986)等人的用法一樣，故事與敘事的概念交替使用，不加區別。

⁴ 這是歷史哲學家Hayden White對此書的讚詞。見White(1987:170)。

強調：「時間因而變成具有人性，以致於它由敘事模式來清楚地表達；而當敘事成爲時間性存在的一個條件，敘事因而達到其充分的意涵。」在其中，與敘事性的時間意涵最相關的，即爲情節（Ricoeur 1984:52；同時參見Ricoeur 1981:165, 167）。換句話說，敘事將人類的經驗組織成在時間上具有意義的一幕又一幕，是一種基本而重要的認知方式（Polkinghorne 1988:1）。而正如上述，敘事創造意義的方式，是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節，使它成爲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也因此成爲一個更大的關係整體的一部分。⁵由於敘事具有以整體概括的方式來理解世界的重大作用，因此許多敘事理論者以不同方式來形容其重要性，譬如稱之爲「典範」（paradigms）、「對現實的包裹觀點」（capsule views of reality）、「詮釋機制」（interpretive devices）或「世界觀」（world views）（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xvi）。⁶

情節賦予既是敘事性的要件，換句話說，是情節才使得故事具有某種方向，將其各部分搏聚起來，使涉入其中的人們感受到某種完整與一致性。情節之所以可以使故事不至於漫無旨歸，就如Eric Ringmar強調的，在於情節有一種「問題意識」（problématique），或者說一種基本的緊張、衝突。而緊張與衝突需要紓解，因此需要故事所涉及的行動者（actor）採取行動（action）（Ringmar 1996:72-73）。Ringmar以情節所展現的故事方向爲中心，扼要地說明敘事、認同、與行動的關係：

從故事參與者的角度而言，敘事有其方向性（directedness），可以從行動的意圖的（intentional）面向來理解。做爲一個有意識的人，就是有其意圖與計劃——也就是試著要促成某種結果，而意圖與其實行之間的連結，一向以敘事的形式來呈現。因此說故事（story-telling）變成行動的前提……。我們告訴自己我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會是怎樣的一種人；我們過去/現在/將來會處在什麼情境；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這些特殊的情形下，可能會怎麼做。（Ringmar 1996:73）⁷

從上述角度概念化的敘事，涉及的是一種人們相當基本的認知過程及其結果。

⁵ Ricoeur因此將情節定義爲「任何故事中支配一系列事件之可理解的整體」（Ricoeur 1981:167）。

⁶ 不過人們以敘事來尋求世界的秩序與意義，未必都成功，這一點可參考MacIntyre（1984:218-219）。對於敘事性究竟是人類生活與行動的本體的（ontological）存在性質，或只是人類認識的（epistemological）過程與結果，不同的理論家有不同的看法（參考Polkinghorne 1988:188, 註10；Carr 1986:Introduction, 特別是Pp.15-17）。筆者的立場近於前者，但是關於這個問題，已超出本文的範圍，無法在此討論。就本文來說，重要的是本土化典範中的確存在著「敘事的」的這一類型，並且對政治/文化有其重大影響。

⁷ Ringmar在此所謂的行動概念，明顯來自韋伯（Max Weber），指的是行動個體賦予主觀意義的那些行爲（Ringmar 1996:66；韋伯 1993:19）。

在其中，人們將個別的行動與事件，連結成爲相互有關的面向，而這些相關面向構成一個可理解的整體。敘事的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也就是人們以時間序列(sequence)的方式尋求、確認其經驗所具有的意義之基本過程及其結果(Bruner 1990:43-44; Polkinghorne 1988: 13,17-18)。在文學、歷史、童話、電影、連環漫畫等敘事「文本」(text)中，作家、歷史作者、流行文化創作者等基於個人獨特的企圖與創意，在呈現作品中的行動或事件的前後因果關係時，經常發展各種特殊的述說方式，譬如同一故事可以用不同情節結構來鋪陳，或甚至以反敘事的方式，刻意模糊、瓦解時間序列的情節安排。再者，許多研究者指出，在一些高度發展或「後現代」社會中，傳統知識與文化合法性所倚賴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或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早已面臨危機，備受挑戰（譬如Lyotard 1984[1979]）。身處其中的人們所普遍呈現的自我認同經常是多元混雜的，鮮少具有統整一致的特徵；而具有後現代風格的小說、影片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這種現象，往往不再具有清晰可辨的開頭、中間、結尾，也沒有明確的關鍵主角、中心要點、行動走向等（譬如Gergen 1991:129-134）。⁸不過即使文學作家或影像創作者可以馳騁創意、自由發揮而瓦解敘事，但這卻非日常生活絕大多數人理解自我及其認同建構的普遍常態。而後現代社會中的自我雖然經常面臨多元社會關係與各種真理宣稱的衝擊，但是後現代的研究取向恐怕過份強調當代人類經驗的失序混亂。例行的日常生活，仍然要比這些取向所認爲的更有秩序而連貫；而生活中，人們的自我也仍然是敘事所建構的(Crossley 2000:56; Holstein and Gubrium 2000: 56-80)。人們必須賦予生活某種意義，而這意味著我們幾乎無可避免地以具有時間深度的敘事方式理解自己。人們的生活，可以說是Ricoeur所謂的「追尋敘事的生活」(MacIntyre 1984:204-225; Taylor 1989:25-52; Ricoeur 1991)。企圖建構統整的關於自我與集體的故事，仍然是大多數日常生活——以及一般政治過程中——普遍常見的基本現象。⁹就此而言，類似Ringmar將敘事、認同、與行動聯繫起來的「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理論取向，使我們可以超越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中對故事或敘事的文本形式結構的分析，轉而探究敘事或故事在人群關係、社會秩序、與政治過程中的角色與作用(Plummer 1995:19; Maines 2001:168-171)。¹⁰族群與民族主

⁸ 參見Michele L. Crossley (2000:55-56)的討論。

⁹ 人們追尋統整的自我故事，以求得清晰而有意義的自我理解，由於種種原因，當然可能遭遇挫折，未必都能成功（參考註6）。

¹⁰ Ken Plummer將此種超越文本的形式結構分析的取向，稱爲「故事社會學」(sociology of stories) (Plummer

義的政治／文化衝突，經常涉及某種歷史宣稱的對立，亦即關於不同人群集體對過去記憶的敘事之衝突。歷史敘事在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認同建構與行動中，往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既然涉及歷史敘事，並且與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認同政治／文化關係密切，敘事認同理論因此有助於我們分析其性質與社會政治作用。

三、文學的敘事的本土化典範與意義的封閉（解釋一）

從70年代以來，本土化典範在文學（與歷史）領域中引起的爭論遠比其它的知識領域激烈而持久，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爭論的主要雙方，主要都以「歷史化」的方式來回答「在台灣所產生的文學究竟是什麼？應該是什麼？」之類的問題，並提出相關的主張。這裡所謂的歷史化，具體而言，指的是爭論的雙方都依賴一個涵蓋台灣人集體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敘事模式來回答這些問題，並提出主張。如上所述，一個敘事必然蘊含敘事者的認同位置與行動主張。由於70年代以來至今在文學與歷史領域所提倡的，主要就是一種歷史化或敘事化的本土化典範，而反對者則提倡一種針鋒相對的歷史敘事，因此使他們之間的爭論遠比其它知識領域中非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引起的爭論來得激烈而綿延久遠。¹¹同時也因此使文學與歷史領域的本土化典範及其引

1995:19)，而David R. Maines則與「文學的敘事社會學」(literary narrative sociology)相對，稱之為「社會學的敘事社會學」(sociological narrative sociology) (Maines 2001:168-171)。

¹¹ 本文審查人之一認為：「晚近文學界反對或批判本土化的聲音有許多並無明顯可辨的『歷史敘事』（如張大春、朱天心、廖成浩、南方朔），把本土化典範的對立面局限在『大中國』文學史觀是無法抓住歷史脈動的。」對於這個批評，筆者有三點回應。第一，本文分析的是關於「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及其所引起的爭議等問題，而非文學界人士任何對於晚近台灣政治、文化本土化的一般性反應。朱天心等人確實對於政治、文化本土化中的一些現象有所責難。譬如朱天心批評「愛台灣」、「真正台灣人」等口號具有排他性、未能包容仍然「心繫中國」的外省人，認為本土化不應成為衡量文化藝術作品的唯一指標等(2001a, 2001b)。南方朔也有類似的指摘(2000, 2002)。不過，這些都不是針對本文討論的台灣文學問題所發的議論。第二，關於台灣文學本土化，爭論者彼此指名道姓，互相批判，而且從70年代延續至今，言論衝突程度愈形激烈，這種現象只發生在本文所討論的圍繞在葉石濤、陳映真兩人的對立雙方。廖成浩的確也有其對於台灣文學的主張。在認同選擇上，他主張走「第三條路」，認為台灣社會需要重視的是基於「庶民」生活於共同鄉土與社區的「文化認同」，而不應強求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重疊合一，文化認同應該脫離國家認同的拘束。他既批評文學界「歌頌本土的右翼本土論者，執著於國族論述」，也批判「頻與國際接軌之洋務論者」過度國際化(2000: 114, 116)。不過，類似廖成浩的主張，在討論台灣文學問題上，多屬零星偶見的言論，也未引起持續而激烈爭論，其性質迥異於本文所論以葉石濤、陳映真為代表的雙方之嚴重對立。第三，進一步而言，以審查人所提及的上述幾位人士為例，如果說他們對政治、文化本土化的看法，或是對台灣文學問題所發的零星議論與歷史敘事無關，恐怕也不盡然。廖成浩認為：

台灣有文字的歷史四百年，無文字歷史深入遠古，落種滋長在這個島上的文化長短皆有、無以

起的爭辯，成爲民族主義的認同政治／文化衝突的一部分，而這種情形並沒有出現在其它知識與文化生產領域。限於篇幅，本文以下僅集中討論文學領域中的本土化典範及其相關問題。不過其中的許多討論，大致上也適用於80年代之後歷史領域中的本土化典範及其引起的爭議。

從70年代末到現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在文學領域中，葉石濤與陳映真一直被視爲支持或反對本土化典範的雙方各自的代表人物。當文學領域的本土化典範在70年代開始發展時，葉、陳兩人在1977年秋「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前不久，各自以先驅者的角色發表了宣言式的文章，形塑了後來長久爭論的基本範圍與方式（葉石濤1977；許南村1977）。筆者接下來就以葉、陳兩人從70年代至今的相關主張與爭論爲例，分析文學領域中敘事的本土化典範之性質及其問題。¹²

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上半葉，成長於日本殖民晚期的葉石濤幾乎是小說方面唯一重要的本省籍文學批評者。¹³當時他專注於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的本省籍作家的作品，稱之爲「（本省的或台灣的）鄉土文學」，並將它們擺在歷史變遷脈絡中詮釋其文化與政治的意義，尤其是從國族認同的角度，回答「對『我們』而言，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世代的本省籍小說家及其作品意味著什麼？」、「它與過去、現在、將來的中國文學發展——包括更廣大的過去、現在、將來的中國國家／民族的發展——有什麼關係？」之類的問題。¹⁴藉著這些問題的回答與意義的闡述，葉石濤將日本殖民時

數計。在常民的身上，生活方式沉積著歷史記憶，歷史記憶滋養著生活方式。這個島嶼就是這樣一個各種傳統薈萃的所在，但在島嶼爲各種傳統提供了新的舞台之餘，這些傳統也在庶民最誠實的生活中呼喊著不被割斷與選擇、不被剝離與物化。呼喊著要恢復本來面目、要獲得均等的機會。(2000: 117)

在他強調的文化認同，以及對本土論者的指責方面，都與上述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密切相關。又譬如上述所引南方朔的批評文章中(2000, 2002)，雖「無明顯可辨的」歷史敘事，不過在他的其它著作中卻充滿明顯而特定的歷史敘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方朔自稱是「比台灣人還台灣人的外省人」，而其理想爲「幸福的台灣、光榮的中國、和平的世界」（見其1979：封面內折頁作者介紹）。在其《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1980)一書的各章，包括〈台灣獨立運動之發展〉、〈三百年來的中國與台灣〉等，即充分呈現其歷史認知。南方朔晚近對政治、文化本土化的非議，可以說是他70年代以來特定歷史敘事認同內在的一部分。

¹² 以葉石濤、陳映真爲代表的雙方當中，除了葉、陳兩人之外的其他人之言論主張等，在本文一開始提及的那些探討台灣文學本土論或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歷史發展過程的既有文獻中，已有詳細討論。本文重點既在於理論分析角度，因此不再重複羅列這些其他人的細節論點。以葉、陳兩人的主張與爭論爲主，已切合本文的問題意識與分析的需要。

¹³ 這一段關於葉石濤的討論，主要根據筆者先前的文章，見蕭阿勤(2000:105-112)。

¹⁴ 這些問題是筆者對葉石濤當時關懷所在的綜合歸納，而非他本人提問的方式。

期到戰後本省人的文學活動敘事化、象徵化。因此他在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集體記憶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不過，我們要注意，和今天的葉石濤不一樣的是，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葉石濤關於台灣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建構的基本參考架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事實上，包括後來在台灣文學「去中國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笠》詩刊與《臺灣文藝》雜誌的成員，也與葉石濤類似（他本人可以視為《臺灣文藝》雜誌的一員），在70年代界定本省人文學活動的文化與政治意義時，都是把它們放到一種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模式中，視為其情節的一部分，進而尋找它們在這個整體經驗的關係結構中一個適當位置。鄉土文學——包括70年代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王拓等人的作品——藉著這種敘事化過程彰顯出來的象徵意義，不只是「（台灣）鄉土的」，而且是「（中國）民族的」。這種意義建構，基本上相應於當時興起的政治改革傾向與文學民族性、社會性的普遍要求。按照前文指出的敘事的一般特徵，這時期以葉石濤為代表的文學歷史敘事大致可以歸納如「表一」：¹⁵

表一 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鄉土文學」敘事模式¹⁶

敘事者	中國人、中華民族
時間的演進	日據時期以來
中心主題	鄉土文學：從台灣到中國的歷程——從鄉土色彩追求民族風格 從地域特性追求民族通性 從傳統追求現代
情節	開始：日據時期本省鄉土文學做為抗日運動的一部分而開始發展，表現重歸祖國之意志的民族精神 中間：台灣光復後本省鄉土文學重歸為中國文學的一支，70年代初興起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第三代本省籍作家的鄉土文學 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追求「鄉土」與「民族」的平衡與融匯，自然地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提升到世界文學的層次

¹⁵ 關於這種敘事，參考葉石濤(1965, 1966, 1968, 1977, 1979a, 1979b, 1979c, 1984)。

¹⁶ 根據蕭阿勤（2000：112）。

葉石濤在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前幾個月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首度較完整地呈現上述文學的歷史敘事（葉石濤1977）。當時陳映真隨即在〈「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中批評葉石濤過份強調日據時期以來台灣鄉土文學的獨特性，忽視其中國的特點。他認為，日據時期台灣的抗日政治與文學運動中的「台灣意識」，就是「中國意識」、「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許南村1977：98）。這個時期陳映真關於「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敘事，可以整理如「表二」。¹⁷比較「表一」與「表二」，其中敘事者的認同位置基本上相當類似。當時葉石濤仍然是以做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在述說文學故事。就此而言，陳映真暗示葉氏文學的歷史敘事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分離於中國的「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許南村1977：97），可以說是過度反應。¹⁸

表二 中國民族主義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敘事模式

敘事者	中國人、中華民族
時間的演進	日據時期以來
中心主題	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反帝、反封建的 以中國民族為歸屬的，追求民族風格的 現實主義的，關懷時代與社會的
情節	開始：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以農村、農民為關切與抗日焦點而興起，為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文學運動的一環 中間：戰後近三十年，文學界與五四新文學傳統斷絕，西化而逃避現實；70年代初新一代作家發展現實主義的鄉土文學，批判西化傾向，追求文學的社會性與民族性 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解決方案	以台灣的中國生活為材料，以中國民族風格與現實主義為形式，貢獻於整個中國文學

¹⁷ 關於這種敘事，參考許南村(1977)，陳映真(1977)。

¹⁸ 我們也許可以說，即使「表一」與「表二」中敘事者的認同相近，但是葉石濤與陳映真理想中的中國並不太一樣。譬如說，陳映真所追求的，是具有某種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國性」，而這是葉石濤所沒有的特點。不過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而言，重要的是陳映真堅持做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一份子，而葉石濤的台灣人認同，當時也仍未脫離做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葉、陳兩人以歷史化或敘事化的取向提出對台灣文學的認識，基本上確立了當時至今文學領域中談論本土化典範的方式。同時陳映真的過度反應，也預示了日後文學領域中關於本土化典範的爭論，經常就是不同歷史敘事之對立，而成爲逐漸浮現的民族主義認同政治／文化衝突的一部分。不過，這僅僅只是從回顧的觀點來看所提出的後見之明，而不能以粗糙的歷史目的論來理解當時至今的變化。¹⁹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沒有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的發生，以及80年代上半葉黨外激進人士的崛起、宣揚台灣意識的黨外雜誌大量出現、國民黨各種方式的持續打壓等因素的交互作用，70年代初出現之黨外的政治理念與反對行動是否會在80年代後迅速激進化，恐怕不無疑問。而在政治反對運動激進化過程中企圖替代「中國史觀」的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亦即80年代之後反國民黨的本省籍政治與文化界人士所謂的「台灣史觀」——是否會快速發展，恐怕也很難說（蕭阿勤2003）。美麗島事件與黨外在80年代初反國民黨的激進對抗、宣揚具有民族主義特質的台灣意識，催發了《笠》與《臺灣文藝》成員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與文化活動。在80年代上半葉，他們開始與黨外發展公開的密切關係，參與反對政治運動。這時候他們與1982年初創辦的《文學界》成員開始提倡將台灣的文學「去中國化」，將日本殖民時期以來台灣（本省）人的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一個具有獨特的「本土化」歷史性格與文學特色的傳統，而這個傳統與五四時期以來的中國（民族）文學進展少有或沒有任何關連。這些本省籍的文學界人士並逐漸以「本土文學」——進而以「台灣文學」——取代「鄉土文學」的稱呼。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後的80年代下半葉，島內台灣獨立運動顯著地發展。在這段期間，這群文學界人士更進一步參與反對政治運動，其文學活動與結果成爲台灣民族主義政治／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從當時到現在，他們在建構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或文學論述上，一直扮演主要角色。²⁰在80、90年代之交，葉石濤出版的《臺灣文學史綱》（1987）與彭瑞金的《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1991），可以說是台灣文學論述從「去中國化」到「（台灣）民族化」的中間發展階段的典型代表（蕭阿勤2000:113-116）。這兩本

¹⁹ John Breuilly批評「敘事的」(narrative)取向，在理解或研究民族主義上，幾乎沒有提供什麼解釋。如同他所指出的，雖然民族主義者本身在構築、闡述民族主義興起的故事上，扮演領導的角色，不過那些在學術界而沒有直接的政治興趣或利益牽涉的歷史研究者，也可能採取這種研究取向。敘事取向視民族主義的興起爲當然，認爲說明民族主義歷史的適當形式，就是敘事。Breuilly指出，就其預設了故事有開頭、中間、與結尾而言，敘事取向通常忽視歷史結局所具有的機遇性質(contingency)。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如果目的論提供的僅僅是問題（歷史過程中，有什麼早期的因素影響了後來的發展？），而非答案，那麼理解或研究歷史的目的論取向，並沒有什麼錯（Breuilly 1996[1994]:156-158, 173）。

²⁰ 上述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學界發展的過程，參見蕭阿勤（1999）；Hsiau(2000:96-110)。

文學史具現了70年代以來文學本土化典範發展的結果，也確立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學歷史敘事的模式。葉石濤在1992年左右讚揚彭瑞金該書時相關的一段文字，是這時期文學本土化典範新發展的典型代表，而不同於他在70年代的看法：

我們之所以把戰前的新文學與戰後的台灣文學看作是割裂不開的整體完全的文學，其原因在於我們認為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環，而不是附屬於任何一個外來統治民族的附庸文學。……

決定台灣文學是獨立自主的文學，而並非任何外來統治民族文學的附庸，這起因於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命運。如眾所知，台灣的每一個歷史性階段裡都出現了外來統治者。他們都是一丘之貉，以抹殺台灣歷史，消滅台灣文化為其首要任務。他們徹底要摧毀台灣意識，把台灣民眾變成一群附〔俯〕首聽命的死魂靈。……

台灣文學便是被壓迫者的文學，也就是弱小民族抵抗外來統治者而建立的抗議文學。這種文學必須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上來戰鬥，爭取台灣民眾「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台灣文學建構在本質性的肥沃台灣文化的土壤上，紮根於台灣民眾的企求民主、自由的渴望上。必須跟毀滅性的任何壓制抵抗。而在這抗議意識裡，最重要的指標，莫過於濃厚堅定不移的台灣意識。那麼什麼叫做台灣意識呢？我們認為認同台灣的土地和人民，認知台灣是獨立自主的命運共同體，且深愛台灣的大自然和本質精神文化願意為它奉獻犧牲的意識。

七十多年的台灣文學就是紮根於這台灣意識，跟台灣民眾打成一片，描述在外來民族的壓制下艱辛地生存下來的台灣民眾生活史的文學。（葉石濤1992[?]: 13-15）

這段簡要的台灣文學史的敘事者，已經明白地不是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是在國族認同上與之完全對立的台灣人。

以《笠》、《臺灣文藝》、以及繼承《文學界》而於1991年底新創刊的《文學臺灣》成員的闡述為主的台灣文學本土化論述，在90年代以來更加激進化。除了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之外，他們更進一步將它「民族化」，亦即一方面將台灣文學的源起溯自數千年前的原住民神話、傳說、歌謠等，將它詮釋為具有多族群源頭的一個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則將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發展詮釋成台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來關懷、尋求、確認獨特的台灣國族認同的過程。換句話說，台灣文學被賦予一種民族的性格，被再現為一個獨特的「台灣民族」的文學傳統，「台灣民族文學」的概念因此被建構出來（Hsiao 2000:110-114；蕭阿勤2000:116）。到了90年代末，葉石濤則指責70年代的陳映真、王拓、尉天驄等人「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並不認同台灣為弱小

新興民族的國家」；而他們所創作或支持的鄉土文學，「其實並未真正反映台灣本土的現實」，「乃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調，並非真正的落實在本土的歷史、人民和土地上」。對他而言，鄉土文學論戰代表的，只是國民黨方面的「舊中國民族主義者」與陳映真等的「新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內訌對決罷了（葉石濤 1997: 42-43, 46-47, 143-145）。90年代至今，以葉石濤為代表的台灣文學本土化的敘事典範，可以整理如「表三」。²¹這個模式可以說是70年代以來敘事的文學本土化典範走向台灣民族主義的充分表現。

表三 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模式²²

敘事者	台灣人、台灣民族
時間的演進	台灣有史以來，尤其是日本殖民時期1920年代以來
中心主題	台灣文學：描寫、反映台灣人歷史經驗的現實主義文學發展過程 多族群的文學發展起源 描寫、反映台灣人被外來統治者壓迫與反抗的歷史經驗 描寫、反映台灣人渴望自由解放、追求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制的意願 不附屬於任何外來統治者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的獨特文學發展
情節	開始：數千年前原住民文學的發展 日本殖民國期做為文化抗日運動一部分的台灣新文學開始發展，表現追求自主的台灣意識 中間：戰後本省籍作家艱困孤寂地創作，以「鄉土文學」之名延續了台灣文學的傳統 60年代《笠》、《臺灣文藝》的創刊代表台灣意識的確立 80年代中鄉土文學、本土文學終於正名為台灣文學

²¹ 關於這種敘事，參考彭瑞金(1991, 1995[1991])；林瑞明(1992)；葉石濤(1997)。

²² 根據蕭阿勤(2000: 122-123)。

	90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獨立自主的「主體性」在確立中 結尾：（依照下列「結論或解決方案」而發展）
結論或 解決方案	促進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制的建立，確立擁有主權的台灣文學， 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

在80年代以來台灣政治／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逐漸取得社會優勢。相對地，以陳映真為代表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敘事，則明顯處於相當邊緣的社會位置。相對於葉石濤與《笠》、《臺灣文藝》等成員的國族認同的變化，從70年代以來，陳映真懷抱著強烈的中國意識，始終主張從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來理解台灣的歷史與文學。他所建構關於台灣文學的敘事，也幾乎未曾改變。從80年代初的「台灣意識論戰」以來，陳映真就與葉石濤、陳芳明、彭瑞金等本土化典範的主要提倡者針鋒相對。90年代末以來，他的文學敘事逐漸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呼應，而與其國內學者合作批判文學界的台灣民族主義。譬如2001年底，《「文學臺獨」面面觀》一書在北京出版。這本書的兩位作者宣稱該書目的，在於「徹底粉碎『文學台獨』、『文化台獨』以至整個『台獨』的陰謀，維護海峽兩岸文學、文化的統一，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民族和國家的統一」。對他們而言，葉石濤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最早敲響了『文學台獨』出台的鑼鼓」；而他一直是「炮製和鼓吹『文學台獨』的掌門人物」，與陳芳明、彭瑞金、張良澤等人形成「『文學台獨』派」（趙遐秋、曾慶瑞 2001:前言2,正文2,273）。陳映真在為該書作序時，認為：「反對『文學台獨』的鬥爭，是我們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爭取民族解放與團結和國家獨立與統一的偉大鬥爭中未竟之業。」（陳映真 2001:3）就像陳映真如此強烈態度的宣戰一樣，這本書的兩位作者抨擊「『文學台獨』是文學領域裏的『兩國論』」，以恫嚇的口氣宣稱「陳芳明們，還有他的前輩葉石濤們，如不改弦更張，他們的『文學台獨』言論必將成為『台獨』勢力的殉葬品而歸於死灰！」（趙遐秋、曾慶瑞 2001:6）這些都讓我們見證了敘事認同的對立所帶來的強烈仇恨，令人慨嘆。²³在北京出版的《「文學臺獨」面

²³ 2000年三月台灣總統大選投票日的三天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在北京的記者會上，對於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聲勢看漲，表示「不管是誰上台，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我們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誰贊成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就支持誰，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嘛！誰要是搞台灣獨立，誰就沒有好下場！」朱鎔基進一步說：

從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是受外來勢力侵略凌辱的歷史，台灣也是多年在日本軍國

面觀》一書，可以說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對台灣民族主義更加強烈的敵意。

歷史敘事對認同的建構與確立，是意義封閉終止所造成的效果。這種意義的封閉終止，主要來自敘事化的整體意義的建構。敘事的整體意義形構排除對事件或經驗可能不同的詮釋，阻止意義的繼續開展。它因此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定位敘事者的認同。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所引起的爭論衝突，涉及不同敘事整體意義形構之間的對立，亦即牽涉不同的詮釋機制、對現實的包裹式觀點、或甚至世界觀的對立。這是為什麼文學領域中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引起激烈紛爭，成為台灣認同政治／文化之一部分的重要原因。

四、「策略的本質主義」只是策略的？（解釋二）

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戰後國民黨面對歷經半世紀殖民統治的台灣，它所進行「去日本化」的統治與教化，可以說是一種官方所主導、由上而下的「強迫的去殖民」。就其對戰後成長與受教育的世代的影響而言，國民黨的「中國化」教化，可以說相當成功。在本土化知識典範開始發展的70年代，推動回歸鄉土、回歸現實潮流的主角實際上是這些戰後世代的成員。當他們發展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探索台灣歷史——亦即提倡那些在戰後社會公共領域中被壓抑的「台灣性」時，其歷史敘事的主體，是做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²⁴美麗島事件之後、80年代以

主義者統治和佔領之下，回想當年中國是何等的貧窮，但是我們還是喊出了「起來！不願做奴役的人民」，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當時的救亡歌曲，我當時只有九歲，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每逢我唱這些救亡歌曲，我的眼淚就要流出來了，我就充滿要為祖國慷慨赴死的豪情。那麼，今天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能夠允許自古屬於中國領土的台灣分裂出去嗎？絕對不能！

見2000/3/16，〈朱鎔基記者會有關對台部分問答全文〉，《中時電子報》。<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vote2000/main/89031604.htm>（2003/9/30瀏覽）。人們對於某種道德與價值理念的執著，以及伴隨而來的愛與恨，在相當大的範圍與程度上，來自於將自己置身於特定歷史敘事而來之連帶（蕭阿勤2003：244）。朱鎔基的談話，正是另一個顯例。

²⁴ 關於戰後世代在70年代回歸現實或回歸鄉土潮流中的角色，參見筆者的研究：蕭阿勤(2002, 2003, 2005)。

來，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其目的不僅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再殖民」，也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強大威脅。80年代以來知識建構與文化生產的本土化典範之發展，尤其是在台灣的文學與歷史領域所看到的，是這種反抗再殖民之努力的一部分主要現象。

在世界各地後殖民時期的政治／文化鬥爭中，某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認同宣稱，一直扮演關鍵的角色。對抱持這種立場的被殖民者而言，他們的認同來自共同的祖先與歷史經驗，是一種集體的真正自我或本質。雖然他們做為被殖民者，彼此之間的一些次要的差異或歷史的變幻，可能一時遮掩或壓抑這種集體的真正自我或本質，但它畢竟恆久長存。在後殖民的社會中，企圖掙脫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屈辱悲傷，重新尋找或提倡這種認同，經常是被殖民者熱烈追求的目標(Fanon 1963: 170; Hall 1990: 223-224)。事實上，本質主義的宣稱，一直是因為社會人群分類規則而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人群強化他們自己身分認同的主要途徑，也是他們以另類方式再現他們自己時的創意來源(Hall 1990:223; Woodward 1997: 242)。80年代以來，做為反抗「再殖民」鬥爭之一部分的台灣文學本土化典範，亦即從「去中國化」到「(台灣)民族化」的歷史敘事模式發展，其中所建構的台灣認同，明顯的具有上述後殖民的本質主義特徵。對這個敘事模式的提倡者來說，文學是表現台灣人長久以來被外來統治者壓迫的歷史經驗之工具，是表達台灣人始終反抗壓迫與追求獨立自主的手段。台灣文學是獨立自主的，在戰前不屬於日本文學，而在戰後則不屬於中國文學，就像台灣人在歷史上始終懷有堅定不移的台灣意識一樣。換句話說，台灣文學真正的「本土化」，就在於能夠展現這種台灣認同，亦即揭示台灣人被壓抑的、集體的真正自我或本質，而這種認同是歷史所確證不移的。在上述所引葉石濤讚揚彭瑞金的相關文句中，正可以看出這種本質主義的台灣認同宣稱，以及認為文學應該是發現、闡明、傳達這種認同的主要媒介之看法。²⁵

不過就當代的認同研究而言，尤其是在文化研究領域中，一種「反本質論」(anti-essentialism)對認同的看法，無疑佔據主流的位置。在這種看法中，語言的作用被認為是「製造」(makes)，而非「發現」(finds)；言語的所指對象(referents)，並沒有本質

²⁵ 葉石濤在其《台灣文學入門》的〈序〉中說：「我從青年時代就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灣文學史，來紀錄台灣這塊土地幾百年來的台灣人的文學活動，以證明台灣人這弱小民族不屈不撓地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如何地凝聚而結晶在文學上。」(葉石濤 1997:1)

的或普遍的性質。認同不是一種實在的事物(thing)，而是存在於語言中的一種描述、一種論述的建構結果，其意義隨時空或使用方式而變化(Barker 2000:166, 190)。這種反本質論，從敘事認同理論的角度來看，就像Stuart Hall在討論加勒比海或黑人離散者(diasporas)的文化認同時所指出的，「認同是我們對自己被關於過去的敘事所定位(position)、以及我們在關於過去的敘事中定位自己的種種方式之命名」；而「過去」在這種歷史敘事中被本質化，用來確保穩定的認同感(Hall 1990: 225)。

就後殖民的政治／文化鬥爭或其他認同政治中處於社會邊緣者的抗爭而言，反本質論對認同的看法似乎在行動實踐上沒有什麼價值。因此一些批評者認為，我們對認同政治要有比反本質論更具建設性的、更正面的理解，需要一種「策略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亦即承認人們因為特定的政治的、實踐的目的，而必需以認同「好像」是穩定的實體之方式行動(Barker 2000: 190)。不少研究者在解構認同的同時，也承認這種策略的本質主義在政治／文化實踐上不得不然的必要性。譬如Hall曾經指出，認同的想像虛構的(fictional)或敘事的性質，必然涉及一種對意義的關閉終止。對他而言，這種關閉終止是任意武斷的；民族、族群團體、與性別等各種認同社群的創造，必然含有這種關閉終止——亦即權力對語言的專斷介入、意識型態的「截斷」(cut)、定位、跨越界線、斷裂等(Hall 1990: 230)。如果沒有對意義的關閉終止，認同建構與政治行動——尤其是所有要求建立新的主體性、企圖改變社會的社會運動——兩者即無可能。對認同與政治而言，這種任意武斷的關閉終止，是「策略的」必要(Hall 1997[1987]: 136-137; 1990: 230)。另外，出身於迦納的黑人哲學家Kwame A. Appiah在批評那些流行於歐美而立基於本質化的生物種族、宗教信仰、古老歷史之非洲認同時則指出，現實政治中如果沒有神話與神秘化，就不可能有集體結盟。集體行動所需的能动性(agency)的發展，似乎總需有對於其認同起源的「錯誤」認識。在批判上述非洲認同本質化的不恰當之後，Appiah試圖提出可以使堅持追求真相、真理的知識份子接納的非洲認同。他認為隨時空的不同，認同在政治上的意義與價值是相對的，擁護或反對某種認同要視情況而定。因此鑑於當前非洲的情勢，他認為一種基於非洲大陸的共同情誼、而非根據種族概念的「泛非洲主義」(Pan-Africanism)，仍然是必要、有用、進步的——「不管它的理論基礎有多麼錯誤或糊塗雜亂」(Appiah 1992: 175-177, 178-180; 1995: 106-108, 110-113)。又譬如Gayatri C. Spivak在談到反抗父權的女性論述策略時，雖然清楚指出對本質主義採取反對立場，是正確無誤的，但她也承認「在策略上我們沒辦法這麼做」。Spivak明白地宣稱：「……既然做為解構主義者

(deconstructivist)……事實上我不能保持雙手乾淨而說『我是獨特的』。事實上我得說我有時候是個本質主義者。」對她而言，選擇有利於目標達成的策略的本質主義，就拋棄了理論上的純粹，而她的研究原本就不在追求前後條理的連貫一致(Spivak 1990: 10-12)。

就80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本土化典範而言，筆者已指出其認同宣稱，具有後殖民政治／文化鬥爭的本質主義性質。我們無法確知葉石濤、彭瑞金等人在建構其台灣人、台灣文學論時，究竟是否曾有意識地定位其本質主義的認同宣稱只是一種策略。到目前為止，他們也不曾公開宣稱其認同建構是一種策略而已。換句話說，爭論台灣文學本土化典範的雙方是否有意識地操作策略的本質主義，這方面的經驗的或文本的證據，我們難以發現。除了上述Hall、Appiah、Spivak等嚴肅自省的理論家之外，在現實的政治、文化過程中，大概很少行動者會明白承認他們的認同宣稱只是策略的。即使是那些對本身的認同宣稱並不認真投入的政治人物，恐怕也極少會願意公開表白他們的宣稱只是達到另外目的策略手段。不過從善意的理解出發，不管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典範含有多少扭曲的歷史、粗糙的概念、武斷的分類、矛盾的論理等，就它做為一種反抗再殖民之行動的努力來說，也許我們都可以接受它做為策略的本質主義而無可避免的必要性。²⁶

類似Hall、Appiah、Spivak等人直接或間接提出的策略的本質主義，重點都在於認為：不能毫無區別地將某些特定行動者的本質主義認同宣稱污名化。然而不管是做為對弱勢反抗的善意詮釋，或是做為反抗者的自我正當化說詞，策略的本質主義在概念上與實踐上都有其必需面對的挑戰。無論在概念上與實踐上，這個主張面對的一大難題是「策略的本質主義如何而可能只是策略的？」首先在概念上，如果本質化的認同宣稱只是策略的，那麼這個主張事實上預設了一個高度工具理性的自我的存在，而這個自我總是能夠明白自己或自己所認同的社群的真正利益所在，隨時能清楚地分辨手段與目的之差別而不致於混淆錯亂。策略的本質主義主張人們因為不同時空的實際目的，而以認同「好像」是穩定實體之方式來行動，預設了行動者清楚地理解到「好像是」（「我只不過以認同好像是穩定的本質來行動而已」）與「實際是」（「我的認同的確是一種穩定的、真正的本質」）之間的區別。就像Appiah在提倡他理想中的

²⁶ 這一段主要回應審查人之一的批評，筆者謹此感謝指教。

泛非洲主義時，一方面指出非洲認同的確是有力與有用的號召，但是另一方面則認為也會有「非洲不是我們所要的旗幟」的時候(Appiah 1992: 180; 1995: 113)。然而認同涉及個人對「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生活？」、「我應該怎樣追求這種生活？」、「我的生活目的與利益何在？」等與自我實現相關的問題之反思。而認同的建構與維持，也需要人們相當程度及相當時間的信念與情感投入。策略的本質主義中一個進行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高度反身性的(highly reflexive)——如果不是「過度反身性的」(over-reflexive)——自我形象，無異否認信念與情感持續投入的必要。如此不僅掏空了認同概念的特殊性，也削弱了認同在解釋行動上的潛力，使認同概念變得貧乏無力。一個只是策略性的手段選擇，而非具有信念與情感投入的認同宣稱，如何還能以「認同」概念來理解與分析呢？預設一個行動者隨時能清晰區分自己宣稱的認同只是「好像」或真的「是」穩定本質，她／他的理性自我總是能清楚地與認同宣稱所建構的那個（並非真正的）自我保持距離，不至於混淆兩者，並且能隨目的而調整手段。這樣的預設，也許會使策略的本質主義變成只是一種遁詞：「我的本質主義是策略的，所以是道德高尚的；而你的本質主義是基要派的(fundamentalist)、邪惡錯誤的。」(Andermahr, et al. 1997: 82)

另一方面，在實踐上，即使一開始是出於策略考慮所建構的認同，也往往有其非意圖的後果。這種認同建構一旦逐漸為人們接受，就往往成為社會互動的憑藉，或甚至是社會行動的目標，而不會只停留在行動者所意圖的策略層次。台灣「四大族群」的社會人群與認同分類的發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80與90年代之交，當民進黨的反對運動方式逐漸講求實際，其領導者為減少閩南人主宰反對運動的印象，以爭取其它背景者的支持，因而提出「四大族群」的說法。這種社會人群分類方式逐漸為台灣社會接受，成為至今十幾年來思考族群與民族主義政治／文化議題時的重要參考架構。同時在自由民主制度的選舉與社會運動的群眾動員中，由於選舉候選人或社會運動領導者經常訴諸族群認同以爭取群眾支持，更促使認同建構的策略／目的、手段／目標的二分趨於瓦解。捍衛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包括平埔族等）認同，往往就成為認同政治中行動者本身的目的。在「族群化」的實際政治過程中（Chang 1996；張茂桂 1997），本質化的認同動員幾乎無法逆轉，不可能停留只是策略的一點上。同時在政治鬥爭中，本質主義也往往引來本質主義的回應。政治族群化的過程，亦即認同建構的「本質化」過程。

我們也許可以說：Appiah、Spivak等人提出的後殖民主義的「策略的本質主

義」，嘗試在抵抗的實際需要與可能造成的社會後果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因此是比較具有責任倫理性質的思考方式；這種權衡，雖然也是有意識而高度自省的，但畢竟不是政客式牟取最大利益的工具理性算計行徑。然而即使如此，本質化認同宣稱所帶來非意圖而無法預期的社會後果，往往無涉於責任倫理。策略的本質主義不可能只是策略的。現實政治衝突的驅力帶來的認同建構本質化及類似反應，不是學院理論家以自我克制的內在思考歷程所能駕馭，而是一種無法以主觀意願控制、難以預期的社會過程與後果。事實上，就轉化群眾意識、動員與擴大人們的支持而言，在有爭議的族群與國族問題上，所有本質主義的宣稱，即使不是有意識而高度自省的，可以說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策略運用的意涵。²⁷文學中的本質化認同動員——以敘事化的文學史的方式來界定「本土化」的「台灣文學」，以及與之對抗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從80年代以來伴隨著政治的發展，其論述上的對立衝突也日趨嚴重，似乎難以逆轉。

基於善意的詮解，敘事的台灣文學本土化典範可以被視為現實反抗的必要策略。不過在概念上與實踐上，策略的本質主義幾乎不可能只是策略的，而策略的本質主義與本質主義之間也難以區分。即使是策略性的認同宣稱，也容易引起本質主義式的認同對抗。潘朵拉(Pandora)的盒子一旦打開，就很難再合起來。這是族群與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而這也是為什麼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在台灣的文學領域一直造成激烈爭論的重要原因。

五、誰的知識？知識的目的為何？（解釋三與結語）

本土化做為一種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的典範，它所引起的智識上的問題，從「誰的知識」到「知識的目的為何」等，都令人相當困惑。在現實政治中，這些難題不容易有讓各方滿意的答案。在後殖民社會反抗再殖民的政治／文化鬥爭中，文學領域的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做為一種賦予人們力量的知識(knowledge for empowerment)，無可避免地涉及知識與權力或學術與政治之關係的複雜問題。這個問題在智識上一直不容

²⁷ 這裡的說法，主要回應審查人之一的批評，筆者謹此感謝指教。

易回答。但是一個明顯的問題，是那些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支持敘事的本土化典範的台灣文學研究，經常受限於某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在這裡的討論脈絡中，經驗主義指的是一種對社會事實做為研究對象的觀點，在其中，概念、理論、以及社會事實被視為是自明的。一個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研究者往往缺乏認識論上的警覺，對概念、理論、甚至「社會事實」本身少有反省，未能體認到這些東西充滿預設的與建構的性質。日常生活語言與觀念的運用通常使人們產生某種虛幻的感覺，認為社會事實是明白可知的。由於經驗主義的研究，未能試圖與日常生活的語言與觀念做某種必要的「決裂」，因此它們在分析經驗時，經常未能超越所分析的歷史上的行動者（在本文討論脈絡中指的是文學作家、批評家與其它相關的行動者）用以理解世界的範疇，亦即沒有與分析對象的經驗層次斷裂，進而達到一種分析的理解。²⁸造成這種經驗主義限制的原因也許很多，但限於篇幅，無法在此細論。不過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或許是由於為了說一個（敘事者自己所屬的認同社群中）愈多人聽得懂的動聽的故事，敘事運用的概念與命題不能離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太遠。換句話說，那些遵循敘事的本土化典範之台灣文學研究的低度理論化，也許是來自於認同社群維持內部相互溝通的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反對本土化典範、呈現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探討，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眾多研究，它們受限於經驗主義而低度理論化，執著於鋪陳特定認同社群的集體故事，較之深受敘事的本土化典範影響者，事實上不遑多讓，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所引起的「誰的知識」、「知識的目的為何」等問題，即使在智識上令人困惑，不易回答，但在政治上的答案卻似乎明白清楚——至少對其支持或反對者而言是如此。在談到90年代發展的「台語文學」引起的爭論時，葉石濤認為相關問題的解決，必須「直至國家主權地位的確立，才有可能露出曙光的一天」（葉石濤1997:45）。至於與中國學者合作批判「文學台獨」的陳映真，則有如前述，將這種批判視為中國民族鬥爭的事業。做為本土化典範的主要提倡者或反對者，葉石濤與陳映真都清楚地相信：文學的問題只有在政治上依賴國家權力才能得到解決；兩人都寄望國家主權與認同的確立，以解決文學身分的問題。這種文學領域的對立，反映了台灣政治、文化本土化發展的一個核心難題，亦即這個發展趨勢挑戰一個較早的歷史、語言、文化、與傳統政體的集體記憶，而此集體記憶又與一個外在興起中的強

²⁸ 這裡對經驗主義的討論多參考Pierre Bourdieu, et al. (1991[1968]:13-18)。

權——中國——糾纏不清。這使得社會人群分類或集體認同造成的社會緊張衝突，亦即那些原本似乎可以在主權國家統治架構下，以國內問題的性質來磋商的社會議題，變成複雜的國際對抗問題(Hsiau 2005: 271-272)。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徵，可以說是獨佔武力之合法使用的一個行政的與法律的秩序，是具有領域基礎的強制性組織(Weber 1978: 56)。²⁹從這個角度來看，對葉石濤與陳映真所代表的雙方而言，文學本土化典範以及與其對抗的典範以國族敘事所達成的意義封閉，只有靠國家權力——如果不是完全的暴力的話——才能得到最終的保障。面對政治，潘朵拉的盒子也許不是真的合不起來。終究來說，文學本土化典範牽涉到國家體制與秩序，這使它在這個領域引起的爭論衝突遠較其它領域嚴重，也使它与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它領域更為密切。

認同的解構與反本質論對認同政治的行動實踐也許沒有什麼作用，對後殖民的政治／文化鬥爭或處於社會邊緣者的反抗或許更沒有太大的價值。而與國家和政治暴力相較，探索真相或真理的知識追求也許是相當虛弱的一種力量。如同Appiah所承認的，在認同建構中，沒有太多理性(reason)存在的空間，而對反抗因認同而來的歧視與暴力而言，認同的學術研究可以說無關緊要，因為實際的鬥爭並非在學術界中進行(Appiah 1992: 178-179; 1995: 110-111)。然而以Appiah為例，當他考慮解決當前非洲現實問題的需要而選擇策略的本質主義的同時，他卻堅持知識份子不可以放棄對真相或真理的追求：「雖然我們不可能單單靠證據與論證而改變世界，不過如果沒有它們，我們也肯定無法改變它。」對他而言，學術界能貢獻的，就是對本質化認同論述的一種干擾破解(disruption)，即使那只是緩慢而微不足道的(Appiah 1992: 179; 1995: 111)。

策略的本質主義不可能只是策略的，即使是策略的認同宣稱也往往造成本質主義色彩的認同對立。文學本土化典範以及與其對抗的典範做為認識台灣的知識原則，終極而言，背後都可能隱含了國家的政治暴力。正因為如此，政治與文化菁英的論述——譬如葉石濤與陳映真等人的文學論述，做為公共敘事的主要來源，亦即做為人們發展集體認同之參考架構的重要來源，變得相當重要，值得我們重視。做為追求真相的一部分工作，在這裡讓我們回到台灣族群與民族主義政治尚未明顯啟動的70年代，同

²⁹ 這是Weber對現代國家的著名的古典定義。晚近的Anthony Giddens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性質，也有類似的看法(1981: 190, 1985: 18-20, 1990: 58)。Giddens區別於Weber之處，在於他不強調國家對武力使用合法性之自我「宣稱」的必要(1985: 20)。

時也是本土化典範萌芽的軸心時期，或者讓我們回到更早的、相對上似乎更「純真無邪」的60年代。1966年，葉石濤在評論吳濁流小說的限制之餘，深切地寄望於本省籍作家。他說：

把台灣人的命運看做整個人類生活的一環，追求人類的理想主義傾向，將使台灣作家走向了坦坦大道，敲開通往世界文學之門，而這正是每一個作家夢寐以求的課題。從特殊的鄉土發掘出發，發揚人性的光輝，繼而昇華為普遍的，人類共有的人性。毫無疑問的，這是大多數台灣作家所採取的途徑，而這一條路也是正確的。但只是雙腳陷於誇張的鄉土觀念的泥沼裏，久不能自拔，這也使台灣作家永遠活在閉塞又狹窄的囚籠，變成野〔夜〕郎自大的狂妄之徒。雖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偉大的小說莫不是伸根於鄉土，流露著醇厚的民族性和脈脈搏動的鄉土氣息，但它們卻也顯示了人類共有的人性和命運。（葉石濤1966:28）

至於陳映真，則在1976年左右討論李行導演的國片時，坦承向來漠視國片及其工作者的艱辛努力，謙稱他個人的性格偏執，有相當大的「墮落為一個最膚淺的教條主義者的危險性」。陳映真同時如此反省：

在我看來，知識份子雖然往往是消除某種因襲的、約定的偏執最為得力的人，但是他自己又很難於沒有另外一種所謂知識份子的偏見。而且，或者簡直可以說：知識份子也者，就是有其特定的知識上的偏執的那一種人罷。知識人按著他們既有的教養、知識和癖好，去解釋世界，去評斷一切的事物。而這些教養、知識和癖好，又無不有其強烈的黨派性。這樣，在知識的範圍內，就劃出許多的派別來，各有他們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語言。而當這些不同的派別相互對立的時候，所謂黨派性、所謂知識份子的意識，就緊張了起來。而這緊張起來的黨派性和知識份子的意識，恐怕正就是知識人墮落成爲各種樣式的教條主義者的最根本的原因罷。（許南村1976:111-112）

很明顯地，不管是葉石濤對耽溺於鄉土觀念的諄諄忠告，或陳映真對知識份子偏執與教條主義的誠懇的自我批判，似乎都與他們晚近各自的文學論述有明顯差距。回顧這些，至多是對文學的敘事的本土化典範以及與其對抗之典範的一點微小的干擾破解，而這也許就是歷史研究探索真相的一點作用。

不過就積極地維繫一個穩定的社會而言，我們恐怕很難滿足於反本質論解構認同的消極干擾破解。基於敘事認同的理論與研究，我們可以認識到：那些基於不同歷史敘事的認同建構的衝突，是人們對現實認識的整體意義形構的對立，是世界觀的衝突。但是人們無法脫離敘事而建立自我，我們也很難想像人們可以輕易地改變、甚至

放棄那些界定他們生命意義的故事，尤其是那種在長久歷史過程中建構起來的集體敘事。因此解決一個特定社會中涉及集體敘事認同衝突而來的政治紛爭，不應該一廂情願地寄望於衝突的各方可以輕易改變、放棄其生命故事。停留在反本質論解構特定認同的干擾破解，對緩解衝突對立而尋找實事求是的方案，往往沒有太大幫助。在許多情況下，它反而助長對人們敘事與認同建構抱持一種譏諷的態度，尤其是對他者的輕蔑鄙薄。停留在這個層次，無助於更深刻地認識人類社會存在與經驗無可避免的敘事性及其相關的認同建構。敘事認同理論的現實意涵是：民主社會中，與集體認同有關的社會衝突對立的有效緩解，有賴人們認知到必須共同生存於這個社會而來的相互包容與妥協，而非對他者生命故事的譏諷輕蔑，過度期待他們的改變或放棄。這正是具有多元文化主義的民主社會的基本精神，也是其可貴之處。其中政治與文化菁英的相互尊重與和解，尤其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以及實質的社會影響。

然而這正是期望消彌文學本土化典範所引起、以及相關類似的認同爭論衝突時的困境所在：人們，尤其是政治與文化菁英，能否認知到必須共同生存於這個社會而包容妥協。在台灣，這些紛爭，向來不是「國內」政治問題而已。毋庸諱言，台灣畢竟是個「不正常」的國家——在國際上很少受到正式承認，而在國內的許多政治、文化衝突則與另一個鄰近而具有敵意的大國所代表的文化與歷史記憶有關。即使反本質論的認同解構對國族性追求的批判充斥，民族國家消亡、區域整合、全球化的呼聲高揚，但是在目前全球民族國家的架構下，一個相對的「正常」國家，恐怕仍然是人們思考如何與他人協商共存所必要的參考架構。晚近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固然引起許多不滿與挑戰，但本質上它是對在地脈絡的強調，是一種追求人們在地思考的政治制度、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的努力(Hsiau 2005: 271-272)。從這個角度來看，做為本土化典範的主要提倡者或反對者，葉石濤與陳映真針鋒相對之處，在於國家主權與認同，這毋寧是切中間題核心，毫無規避。台灣的主權地位與政治身分仍然面臨挑戰，使這個島嶼社會的成員仍然缺乏可賴以思考其共同未來的明確參考架構。因此文學本土化典範所引發的爭論衝突的持續，可以想見。從本土化典範的先驅、亦即回歸鄉土或回歸現實理念出現的70年代算起，至今已歷三十餘年。當時這個文化潮流的主要推動力量的戰後世代年輕人（蕭阿勤2005），如今也已步入晚年。歲月無情，歷史仍然在試煉這個島嶼社會，質問它何去何從。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文崇一，1991，〈中國的社會學：國際化或國家化？〉，《中國社會學刊》15期，頁1-28。
- 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編，1985，《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台北：桂冠。
- 朱天心，2001a，〈當「台灣人」變成一塊肥美的大餅〉，頁66-69，收錄於其《小說家的政治周記》。台北：聯經。
- ，2001b，〈孤絕之島〉，頁135-139，收錄於其《小說家的政治周記》。台北：聯經。
- 林瑞明，1992，〈現階段臺語文學之發展及其意義〉，《文學臺灣》3期，頁12-31。
- 林惺嶽，1987，《臺灣美術風雲40年》。台北：自立晚報。
- 南方朔，1979，《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台北：四季。
- ，1980，《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台北：四季。
- ，2000，〈愛台灣：特定場合的催情劑〉，頁151-155，收錄於其《語言是我們的海洋》。台北：大田。
- ，2002，〈台民粹政治與新鎖國主義〉，《亞洲週刊》16卷13期，頁4。
- 韋伯（Max Weber）著，顧忠華譯，1993，《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台北：遠流。
- 陳映真，1977，〈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仙人掌雜誌》5期，頁65-78。
- ，2001，〈序〉，頁1-4，收於趙遐秋、曾慶瑞著，《文學臺獨面面觀》。北京：九州。
- 許南村（陳映真），1976，《知識人的偏執》。台北：遠行。
- ，1977〈「鄉土文學」的盲點〉，頁93-99，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流。
- 游勝冠，1996，《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
- 張茂桂，1997，〈臺灣的政治轉型與政治的「族群化」過程〉。頁37-71，收於施

正鋒編，《族群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

傅大為，1991，〈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對臺灣「行爲及社會科學中國化」提法的思想史研究〉，《島嶼邊緣》1期，頁103-125。

彭瑞金，1991，《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自立晚報。

——，1995(1991)，〈鄉土文學與七〇年代的臺灣文學〉，頁250-259，收錄於其《臺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

葉石濤，1965，〈臺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期，頁70-73。

——，1966，〈吳濁流論〉，《臺灣文藝》12期，頁25-30。

——，1968，〈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臺灣文藝》19期，頁37-45。

——，1977，〈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14期，頁68-75。

——，1979a，〈日據時代新文學的回顧〉，頁41-43，收錄於其《臺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

——，1979b，〈現代主義小說的沒落〉，頁49-50，收錄於其《臺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

——，1979c，〈作家的世代〉，頁41-43，收錄於其《臺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

——，1984，〈六十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文訊》13期，頁137-146。

——，1987，《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1992(?)，〈撰寫臺灣文學史應走的方向〉。頁13-23，收錄於其《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

——，1997，《臺灣文學入門：臺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春暉。

楊國樞，1993，〈我們爲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1期，頁6-88。

楊國樞、文崇一編，1982，《社會及行爲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廖咸浩，2000，〈一種「後台灣文學」的可能〉，《聯合文學》190期，頁110-117。

趙遐秋、曾慶瑞，2001，《文學臺獨面面觀》。北京：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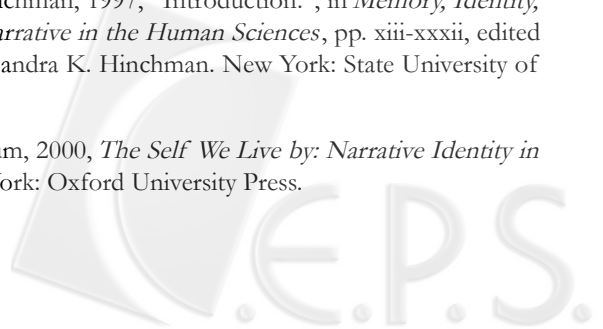
- 蔡勇美、蕭新煌編，1986，《社會學中國化》。台北：巨流。
- 蕭阿勤，1999，〈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期，頁1-51。
- ，2000，〈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6卷2期，頁77-138。
- ，200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9卷1期，頁181-239。
- ，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臺灣一九七〇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第5期，頁195-250。
- ，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頁1-58。

二、英文書目

- Andermahr, Sonya, et al., 1997, *A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 London: Arnold.
- Appiah, Kwame Anthony, 1992,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frican Identity." in *Social Postmodernism: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pp.103-115, edited by Linda Nicholson and Steven Seidma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ker, Chris,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Barthes, Roland, 1977(1966),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Image, Music, Text*, pp.79-124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edited by Stephen Heath.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ourdieu, Pierre, et al., 1991(1968),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Breuilly, John, 1996(1994),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in *Mapping the Nation*, pp. 146-174,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 Bruner, Jerome,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rr, David, 1986,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Mau-kuei Michael, 1996,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thnization of Politics in Taiwan.", in *Taiwanan der Schwelle Zum 21 Jahrhundert - Gesellschaftlicher Wendel, Problen und Perspektiven eines Asiatischen Schwellenlandes*, pp.135-152, edited by Guter Schubert and Axel Schneider. Hamberg, Germany: Institute fuer Asienkunde.
- Crossley, Michele L., 2000,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Fanon, Frantz,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 Gergen, Kenneth J., 1991,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nthony,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 ,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ume Two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Hall, Stuart, 1997(1987), "Minimal Selves.", in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second edition*, pp.34-138, edited by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London: Arnold.
- ,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222-237, edited by Jonathan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inchman, Lewis P. and Sandra K Hinchman, 1997, "Introduction.", in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pp. xiii-xxxii, edited by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olstein, James A. and Jaber F. Gubrium, 2000, *The Self 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iau, A-chin (蕭阿勤), 2000,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 2005, “Epilogue: Bentuhua—An Endeavor for Normalizing a Would-be Nation-state?”, in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edited by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Jaspers, Karl T., 1953(1949),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otard, Jean-François, 1984(197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cIntyre, Alasdair,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aines, David R., 2001, *The Faultline of Consciousness: A View of Interaction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Polkinghorne, Donal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 and Social Words*. London: Routledge.
- Ricoeur, Paul, 1981, “Narrative Time.”, in *On Narrative*, pp.165-186, edited by W. J. T. Mitchel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1,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in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pp. 20-33, edited by David Wood. London: Routledge..
- Ringmar, Eric, 1996,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mers, Margaret R. and Gibson, Gloria D.,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37-99,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UK: Blackwell.
- Sarbin, Theodore R., 1986,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in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 3-21, edited

by Theodore R. Sarbin. New York: Praeger.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Charles,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hite, Hayden, 1987, "The Metaphysics of Narrativity: Time and Symbol in Ricoeu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169-184.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oodward, Kathryn, 1997, "Motherhood: Identities, Meanings and Myths.",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239-285, edited by Kathryn Woodward. London: Sage.



“Indigenization” (*bentuhua*)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c Essentialism and State Power

by A-chin Hsiau

129

Abstract:

“Indigenization”, or *bentuhua*, a general idea that the uniqueness of Taiwanese society/culture/history must be appreciated and interpret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Taiwanese per se, has been a powerful paradigm that directs and informs the discourse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ince the 1980s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I aim to explain why the literary indigenization paradigm has come to cause fiercer debates and has closer connection with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than the indigenization idea in other areas (except history). Some studies have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empirical context of the creation and rise of the indigenization paradigm in literature. Instea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tical dimension and offers three theoretical, analy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questions: 1) because the literary indigenization paradigm engenders a kind of antagonism between different historical narratives which is difficult to be weakened; 2) because in the identity politics strategic essentialism is ready to slide from a mere strategy to a form of de facto essentialism that provokes an essentialist backlash; 3) because the literary indigenization paradigm and the conflict caused by it, after all, involves state power. In this paper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centers on the essence of the indigenization paradigm in the area of literature, that is, a narrativized view of reality as a meaningful configuration that identifies the narrator in an exclusive way.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indigenization, narrative identity, strategic essentialism, nationalism